

發揮香港優勢 助推粵港澳大灣區發展

粵港澳大灣區規劃正緊鑼密鼓地籌劃之中。籌劃這一世界級的大灣區，自然是為了強強聯合，在發展中發揮更強的優勢。值得關注的是，近年內地發展的勢頭強勁，尤其是南方諸城的領跑態勢，讓人刮目相看。曾經領先廣東省各城市的香港，如今在經濟總量、貨櫃吞吐量等不少領域，已被深圳、廣州超越，這是不爭的事實。但無論如何，大灣區的發展，瞄準的是全球市場，接軌的是國際通道，以此為出發點，粵港澳大灣區是香港概念的大灣區，還是廣東概念的大灣區？值得探討。

紀碩鳴
資深評論員

儘管香港近年發展如逆水行舟，不進則退，但在粵港澳大灣區中，香港的優勢依然顯著。從綜合發展優勢上看，香港仍具潛能。不久前，中國城市競爭力研究會公佈的中國城市綜合競爭力排行榜，對中國34個省市進行了排名。以往一直穩居榜首的香港，首次被上海超過，但還是排在深圳、廣州之前。

獨特優勢依然突出

香港作為亞太地區主要的國際金融、貿易、航運、旅遊和信息中心，擁有全球最繁忙的貨櫃港，是全球最主要黃金交易中心之一和全球最自由經濟體，也是資產質量與城市安全程度最高的城市。因此，在本屆競爭力排行榜中，香港競爭力的獨特優勢依然突出。

香港的優勢首先來自制度，奉行自由港的市場經濟制度，加上嚴謹的法律體系，讓香港成為有效率、有秩序的社會。

到目前為止，內地從香港學了不少貿易和市場的國際慣例。其實香港真正的核心優勢，在於法律體系，包括處理經濟糾紛、打擊腐敗的制度及程序。這是西方較先進的制度用在華人社會的成功試驗，在整個亞洲是最成功的。

回歸後，香港奉行「一國兩制」，除了政治制度尚待完善之外，經濟、社會、法律、金融等方面的制

度都非常完善。如果深入到社會各個階層去看，香港回歸前後，資本主義的生活及工作方式沒有發生太大變化。營商環境、法律制度、開放程度，香港在整個亞洲仍是最好的。港交所行政總裁李小加曾表示「香港依靠制度優勢在中國改革發展過程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香港因其制度優勢，仍是中國未來發展的核心武器之一。」

香港優勢備受國際認同

到蘭桂坊酒吧街，處處可見外國人，蘭桂坊長期保持生意穩定增長，即使在SARS期間，也沒有受到太大影響。這說明國際人士喜歡香港，對香港非常有信心。

都說香港是一個國際化程度很高的城市，這是因為外資機構在香港雲集，包括最大的投資銀行及商業銀行、最大的跨國公司、最主要的媒體、最重要國家的外交駐外機構等等。這種國際化氣候，在亞洲任何其他地方都無法找到，這就是香港獲得國際認同的優勢。

跟內地相比，香港在經濟、生活上優勢並不突出，但國際上的認同，香港遠超內地。因為香港有良好的法律制度保障，有健全的公共衛生體系，有開放的國際化平台，與全球各大金融市場無縫對接。

香港不僅是中國的香港，還是國際的香港；香港

人不僅是香港人，還是國際人。這種優勢不僅是內地「走出去」、融入國際市場的過程中最需要的，也是粵港澳大灣區發展最需要的國際優勢。

香港創科基礎雄厚

不久前，國家主席習近平對在港兩院院士來信作出重要指示，肯定香港具有雄厚的科技基礎、高素質的科技人才，支持香港建設成為國際創科中心，為國家發展作出重要貢獻。香港擁有人才、資訊自由優勢，又有創新的優勢，又是國際金融和貿易中心，擁有良好的法律制度、司法獨立、完善的知識產權保護，再加上「一國」和「兩制」的雙重優勢、先進的基礎建設、世界級的大學、專家及科研人才、吸引外國一流創科人才的強大能力，香港完全具備發展成國際創科中心的基礎。

香港在創新方面的能力、潛質和發展空間，日益獲得國際的認同。例如，美國麻省理工學院（MIT）早前宣佈，在香港成立全球首個海外創新中心；瑞典卡羅琳醫學院（Karolinska Institutet）也宣佈，在香港成立首個海外科研基地，專注生命科技和再生醫療；美國康奈爾大學（Cornell University）與香港城市大學亦不斷擴大合作，已開辦動物科學博士課程。

細數香港的優勢，在粵港澳大灣區建設中都應充分發揮。所以，粵港澳大灣區的發展應更彰顯香港概念。

加快填海增發展用地儲備

許楨
資深評論員

承前所論，愚以為，既然港府「身家豐厚」，大可如特首林鄭月娥所言，在可見將來，都不必太在意賣地收入的多寡，反映以減輕民眾住屋負擔為施政重中之重。在此思路下，未來推出的私樓地，無論多寡，大可悉數規定建「港人首置盤」，讓新一代上車有望，避免國際游資與跨境投資者的衝擊。

而公帑補貼的資助性房屋，則以提供「居住權」為主，弱化業主獲利的功能。如此，既可避免以公帑助人投資的道德風險，亦可緩和資助線上下兩端市民的痛苦。

從綠置居、新居屋到首置盤，房協、房委會與市建局，究竟在林鄭的房策佈局中，將會擔當何種角色？眼前只知將會有所變動，但方向未明。例如，房協、房委會同樣興建公屋，前者在財政上又果真如林鄭所言，將由政府「一力承擔」，甚或可免地價，那麼，房協、房委會及其產品的市場定位又有何不同？

林鄭如欲參考新加坡的房屋政策，獅城土地房屋政策之所以成功，八成人居於資助性房屋、人均居住面積為香港兩倍，都僅屬其果。獅城組屋政策成功之因，其一，在於數十年來，政府大力收地，新加坡公有土地儲備，比絕大多數先進經濟體都多。在土地開發方面，新加坡由中央自上而下地規劃。港人到當地旅遊，在此花園城市所見的綠茵處處，基本上是可供政府隨時建屋之地。其二，當然就是政府厲行「具年限的土地使用權制度」（Leasehold）。

反觀香港，本地城市發展之怪，在於政府土地向來不多，在「小政府大市場」、「簡單稅制、量入為出」的傳統下，土地從來是按

需開發，沒有長遠儲備的慣例與條件。事實上，今天九龍灣兩岸與灣仔區、東區不少沿海地，都是百餘年來，由渣甸、太古、周壽臣、利希慎等華洋商人移山填海而來，政府角色有限。

與此同時，城市規劃與更改用途的權力，又操諸行政部門以及由政府委任的城規會之手。由是形成港府無熟地、業權人無發展權的狀況。顯然，兩任特首都意識到必須突破此死結，在「土地大辯論」完成前，林鄭亦打了開口牌，與前任特首梁振英一樣，傾向在維港以外填海。土地供應專責小組主席黃遠輝亦明言，政府要建立土地儲備，使之推動「公私合作」時，具有與發展商討價還價的籌碼。

然而，林鄭是否低估了填海對漁業、生態、居住環境、航運的影響，尚難定論，最起码，漁業界近日就表達了對填海的強烈不滿。在相關會議上，也有漁民指出了重點——難以相信填海所得土地，可以用來解決基層住屋問題。

事實上，1990年代以降，自回歸前後至今，本港填海減少卻不停頓，問題在於所得用地，十之八九都用在機場、西九、高鐵，以及與之相連的高速公路之上，與1970、80年代，以填海地營建新市鎮的發展模式，並非一回事。

愚以為，香港應當填海，但一如既往，填海地應適當地用作商業發展之用。根據新加坡的經驗，港府可拿出政治勇氣，統整、歸納新界鄉郊土地業權，這比填海更能建立土地儲備。以此基礎，與發展商作「公私合營」，協同發展效應更佳。

由「廚房助理」到「二廚」

徐英偉
勞工及福利局副局長



落實「一國兩制」，大家都抱着一種戰戰兢兢的心情，面對這個史無前例的挑戰，外界便將加入問責行列形容為「熱廚房」。回想自己亦於2008年，從商界踏入這個「廚房」，當上了民政事務局「廚房助理」一職，主要負責聯繫的工作，轉眼間已十年時間，今年更升為勞工及福利局做「二廚」。

套用電視劇的金句，「人生有幾多個十年？」從事公眾事務確實令自己眼界大開，深懂凡事可有千萬種的處理方法，正所謂「一點生萬法」。至於，人稱「熱廚房」，其實也可以從另一角度看，作為二子之父，偶而也要為兒子準備餐點，亦對「廚房」有所啟發，「其實，廚房為煮食的地方，開爐生火，當然會熱」，最重要的問題為，政策局這個「廚房」所製作出來的食品，是否適合到有需要的人士，「好味得來又要健康」。

十年的「廚房助理」，需要與各界進行政治聯繫的工作，介紹「菜式的內容」，民政事務局兩名「大廚」曾德成及劉江華，各有風格，「德成局長」沉實穩重，泰山崩於前而色不變，令到我這個「政壇初哥」從中偷師，獲益良多，而另一位局長劉江華，除大家都是來自民建聯之外，其多年地區直選經驗，對強調與人接觸的民政事務工作，的確存在不少的優勢。

在今屆特區政府，有幸從「廚房助

理」升做「二廚」，更轉了「廚房」到勞工及福利局，可能自己的「民政味」濃，上任至今，政界朋友及議員們也未適應。今年8月，為當「二廚」的一周年，作為「二廚」再不能只停留在政治聯繫及推銷政策的角色，還需要「落手落腳」與「大廚」互相配合，「研究菜單，食材配搭」等等。

明白到自己非「科班紅褲仔」出身，對福利政策都是半途惡補，但有幸「大廚」局長羅致光坐鎮，而眾所周知「羅大廚」為社福界的「殿堂級人馬」，對社福政策了若指掌，加上，界內的核心夥伴，也是「大廚」的「高足」，大家有共同的語言。至於「廚房助理」馮興禮(Henry)，為80後的年輕人，為團隊帶來一股年輕的氣息。

關顧市民的需要，一點都不能鬆懈。正如早前推出回顧一周年短片所述，在過去一年，勞福局推出了10多項措施，包括高額長生津、優化職津、注資及優化持續進修基金等，從長者、兒童、個人持續進修及家庭照顧等。明白到社會及業界對社福的要求相當急切，但如「大廚」所言，必須維持「質素」，即政策措施必須到位，否則被「退回」重議的話，反而會因快得慢，最終苦了受助者本身，這是絕對不願看到的事情。

未來工作亦會相當之繁忙，包括有檢討幼兒照顧服務、康復計劃方案、檢討產期等，但重中之重，就是「取消對沖」安排，由於屬新政策，對不同持份者都有不同程度的影響，推出的措施必須平衡各持份者的訴求與需要，同時更對最需要協助的受助人，提供較優厚的援助。由於這是「本屆的招牌菜」，必定是又大鍋又熱騰騰。

港珠澳大橋不僅僅是一條大橋

陳曉鋒
法學博士 「就是敢言」執行主席 城市智庫研究員



港珠澳大橋是在「一國兩制」下，粵港澳首次合作建設的特大型交通基礎設施。作為中國建設史上里程最長、投資最多、難度最大的跨海橋樑項目，港珠澳大橋的建設意義深遠。工程完成後，從香港到珠海只需半小時，粵港澳三地將緊密連接在一起，這對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實現再次騰飛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

香港到珠海只需半小時

在沒有大橋之前，從珠海經虎門到香港需要4個小時，大橋通車後，港珠澳大橋將作為一個連接紐帶，打通珠江三角洲東西兩軸，港澳居民去內地也越來越方便，讓大灣區變成一個6,600萬人口的「一小時超級生活圈」。同時，隨著港澳連通內地的巨型基建逐步開通，也有效擴大香港機場和貨櫃碼頭的腹地，為港澳和內地的人員貨物往來提供實實在在的便利。應該說，這個跨境「超級工程」打通了粵港澳大灣區發展的「任督二脈」，使得港澳的未來發展與內地更

加緊密地連接在一起。

助港青融入大灣區創業就業

事實上，由於香港租金和人力成本居高不下，創科氣氛沒有內地那麼濃郁，銀行對創業者的優惠政策也沒有內地多。但是，我們也應該看到，這幾年有很多香港青年奔赴內地特別是珠三角創業，且取得了不俗的成績。因此，對於香港青年而言，他們迎來了更好的人生機遇和更廣闊的發展舞台。隨著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的出台，必將有更多香港青年融入內地大展拳腳。

港珠澳大橋、廣深港高鐵等重大工程，讓香港通往內地更加便捷，連接輻射更廣闊腹地。國家「一帶一路」推進、粵港澳大灣區建設、人民幣國際化等，也將給香港帶來前所未有的機遇。香港青年具有國際視野，是發展新興產業尤其是創科和文化創意產業的強大生力軍。粵港澳三地也將共同推進建設青年創業就業基地，集聚青年人才，將給青年人帶來創業就業發展機遇。香港青年需要做的，就是多深入廣袤的內地，多了解國家民族歷史，把握好歷史機遇，用努力行動與祖國同心向前。

美國挑起貿易戰影響全球經濟增長

鄧志寰
中銀香港首席經濟學家 中國人民大學國際貨幣所學術委員

隨着貿易戰的持續發酵，全球貿易的不確定性開始影響金融市場信心，引發全球金融市場波動，亦導致新興市場大幅度調整，不排除出現金融動盪的可能性。

貿易戰導致全球金融風險上升

中美貿易戰越演越烈，在衝擊全球貿易環境並進而影響世界經濟增長前景的同時，各類風險迭加的可能性有所上升。美國陸續出台貿易保護措施後，全球股票市場、債券市場和外匯市場出現多輪較大幅度震盪，導致資產價格持續調整，對投資者信心造成一定衝擊，可能抑制實際投資需求並影響全球經濟表現。

如果貿易戰導致主要經濟體出現通貨膨脹壓力，將與美國縮表和加息進程形成共振，帶來進一步的緊縮效應，加大金融風險。

全球經濟增長最大不確定因素

美國和中國是全球最大的兩個商品貿易國，且互為對方最大的商品進出口貿易國。二者之間的貿易戰在影響雙邊貿易的同時，將直接影響全球貿易增長，從而對全球經濟產生全方位的影響。

中美貿易戰意味着對現行國際貿易規則的衝擊，將影響全球貿易增長及實體經濟整體表現。回顧歷史，1930年代美國曾發起針對全球主要經濟體的貿易戰，一度對33%的商品徵收45%的關稅，並持續了4年之久，導致全球貿易量下降了25%，全球貿易金額下降了40%，全球貿易體系遭受重創。

美國加徵關稅後，主要貿易對手陸續採取反制措施，國際貿易壁壘增加，衝擊全球貿易復甦。美國與北美、歐洲和亞太區之間商品貿易的赤字分別有886億、1,737億和4,671億美元，美國在針對中國掀起貿易戰的同時，對加拿大和歐盟等主要貿易夥伴也輪起貿易保護大棒，將直接影響上述區域的貿易表現，進一步阻礙國際貿易環境改善，進而對環球經濟增長帶來新的衝擊。

短中長期措施結合應對貿易戰

從中美貿易戰影響角度看，美方制裁是影響國際貿易發展和金融市場穩定的主要因素，總體而言，貿易戰帶來的金融風險大於貿易風險，對實體經濟的衝擊將漸進上升。為此，我們應綜合施策，短中長期結合，做足準備，妥善應對貿易戰帶來的衝擊。

一是短期內，密切監控貿易戰的發展及其對轉口貿易商及各類出口企業的衝擊程度，針對美方不斷出台徵稅清單的失去理性的行為，沉着冷靜，理性應對，動態評估相關影響，了解業界需求，及時提供出口信用保險及其它各類支持措施，提升抵禦貿易戰和相關金融風險衝擊能力。

二是加強國際政策協調，借助WTO及G20等平台，針對貿易戰激化導致全球經濟下行風險增加的事實，敦促相關國家加強對話，



匯賢起動、同心護港、珍惜群組、反黑金、反「港獨」關注組聯合主辦「抗議美國無理引發事端」「不要貿易戰 不怕貿易戰」宣言集會。

探討全面阻止貿易保護主義的具體措施。中國可以與其他WTO成員一道，向WTO投訴貿易戰對各國貿易地位的不利影響，要求美國撤回貿易保護措施。

三是在中長期內，從全球產業鏈的角度，減少雙邊貿易不平衡，加快推進多邊貿易發展進程，探討調整相關行業佈局的可行性，控制貿易戰的衝擊範圍。加快拓展東盟及「一帶一路」沿線新興市場，帶動更多的中小企業走出去，從東盟入手構築全球範疇供應鏈、產業鏈和價值鏈體系，加強規避貿易衝突的能力建設，降低貿易戰的負面影響。

四是通盤考慮貿易金融的交叉影響，擺脫就貿易談貿易的思維定勢，把貿易戰與美國加快加息的可能影響結合在一起，整體應對潛在的金融風險，做好維護金融機構穩健運行和保持金融市場基本穩定的相關預案。經歷了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衝擊和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的雙重洗禮，內地經濟實力不斷增強，金融監管能力和金融機構的管理水平均有提高。但是防控金融風險永遠在路上，需要隨時做好準備，積極採取短中長期結合的有效措施，控制相關金融風險可能帶來的負面影響。

五是發揮香港「一國兩制」的獨特優勢，充分利用香港的貿易關係網絡，尋找空間，協助中美雙方加強溝通、妥善解決貿易爭端，香港各類智庫亦可以發揮國際輿論引導和與美各類層面溝通等作用，為中美貿易政策協調建言獻策。從全球戰略角度，尋找中美貿易平衡的解決之道。

（本文轉載自2018年8月《紫荊》雜誌，內容有刪減。）